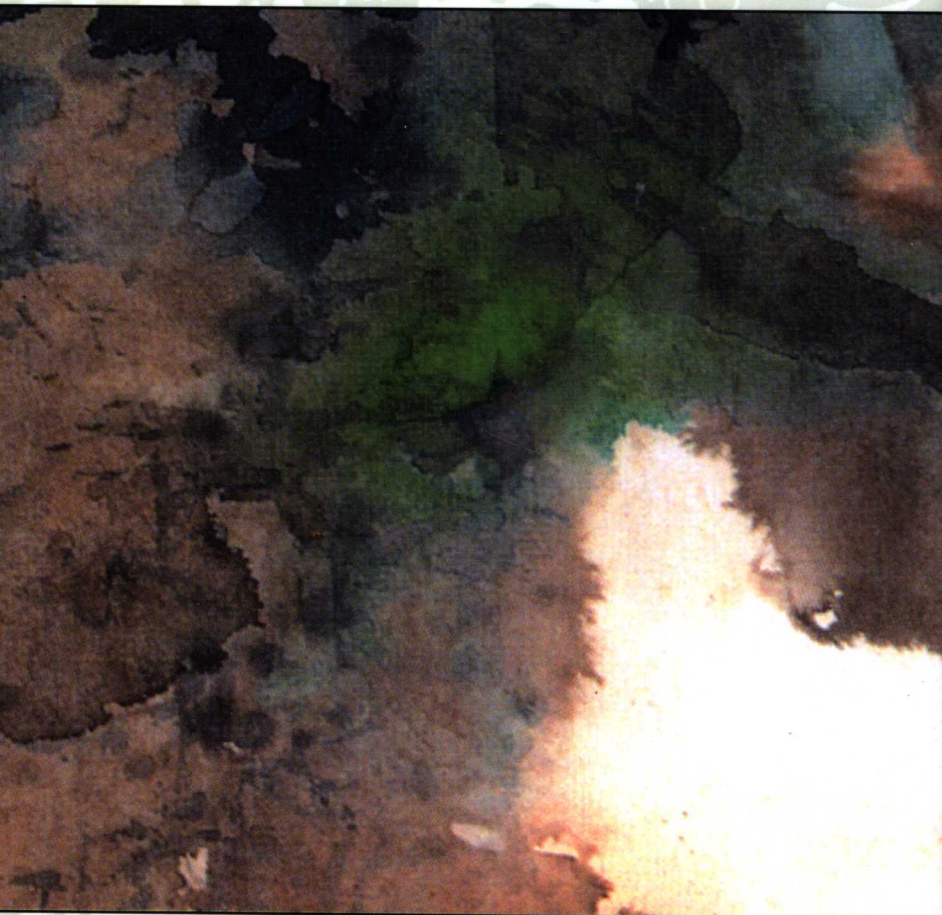


現代散文鑒賞辭典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現代散文鑒賞辭典

主編
賈植芳

上海辭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散文鉴赏辞典/贾植芳主编. —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03. 6

ISBN 7 - 5326 - 1158 - 2

I. 现... II. 贾... III. ①散文-文学欣赏-中国-现代-词典②散文-文学欣赏-中国-当代-词典
IV. I207.65 - 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6756 号

封面设计 汪 溪

现代散文鉴赏辞典

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 印张 46.375 插页 5 字数 1 710 000
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 000

ISBN 7 - 5326 - 1158 - 2/I·40

定价: 60.00 元

《现代散文鉴赏辞典》

主 编 贾植芳

副主编 孙光萱 王 孙

特约撰稿人

王 蒙	王富仁	叶至善	古远清	庄重庆	孙玉石
孙绍振	李元洛	吴福辉	陈孝全	赵丽宏	钱理群
徐缉熙	舒 乙	谢 冕			

撰稿人

于 止	王 孙	王聿祥	王铁仙	邓逸群	乐秀拔
包雅萍	任彦钧	刘鸿模	孙光萱	孙琴安	朱 曦
朱元寅	朱晓琳	何永波	吴周文	吴晓晨	吴惠兰
张 茜	张 森	张克平	李昭游	汪义生	沈 俊
肖向丽	邹兆玲	陈 静	陈 慧	陈秀英	陈菡蓉
陈青生	周伯军	林 薇	南 山	姜元花	施 勤
柯平凭	胡云社	赵 青	唐本强	徐霖恩	袁勇麟
谈 勇	谈彦廷	陶媛媛	顾 琛	商友敬	章 妮
黄 岚	董丽敏	蒋 敏	蒋向艳	谢正宜	漆 瑗
蔡之国	潘颂德	戴 达	糜若焉		

(特约撰稿人和撰稿人名单均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序 言

贾植芳 孙光萱 王 孙

—

现代散文发轫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前期。当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，置身于时代前列的启蒙思想家们忧心如焚，他们翘首异域，振臂高呼：“拥护那德莫克拉西（Democracy）和赛因斯（Science）两位先生。”（陈独秀：《本志罪案之答辩书》）扩大了人们的视野。正是在反对封建道德、崇尚个性自由、追求民主科学等新思潮的推动下，现代白话散文很快脱颖而出。最早也最著名的是《新青年》杂志所开辟的“随感录”专栏，接连发表了陈独秀、鲁迅、钱玄同等人挥洒自如、大小由之的文章，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，而且开日后杂文创作之先河，影响极为深远。稍后，与重在议论的“随感录”不同，抒情散文作为现代散文的主干开始产生，“五四”以来第一批散文家不时有佳作问世，令人耳目一新，进一步显示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实绩。

万事开头难。现代散文的发展并非一马平川，它既要破除封建守旧势力的节节抵抗，又要在创作实践中正确解决继承古典遗产和借鉴外国经验的问题，进而确立崭新的散文文体现。

封建守旧势力为了实现文化专制主义，长期维持少数人垄断书面语言的局面，拼命攻击白话文“鄙俚浅陋”，是“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”（林纾：《致蔡鹤卿太史书》），登不了大雅之堂。对于这些歪理谬说，白话文运动倡导者自然不会轻易放过，胡适就曾巧妙

而有力地申述了古今语言的巨大变化：“古人乘舆，今人坐轿；古人加冠束帻，今人但知戴帽”，“若必叫帽作巾，叫轿作舆，岂非张冠李戴，认虎作豹？”（《〈尝试集〉初版自序》）可见白话代替文言，实在是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。谁都知道，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。封建卫道士所以抱住“文言”的外壳不放，目的正在于“尊孔”、“载道”，替圣人“立言”。他们视腐朽为神奇，不敢越古人的雷池一步，只知道依样画葫芦地大写没有灵魂、空洞无物的“仿古文”，这就不能不同样激起启蒙思想家和现代散文作家的强烈反对。胡适倡导“有什么话，说什么话”（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），刘半农坚持“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”（《我的文学改良观》），周作人主张写“即兴”的“言志”的散文，反对写“赋得”的“载道”的文章（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），可以说都是有的放矢，令人信服。

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和继承古典散文遗产的问题。由于历史原因，我国向来以诗文为正宗，视小说、戏剧为不入流。散文创作历史悠久，佳作如云，上溯先秦诸子，中经唐宋八大家，晚迄明清小品，无不争奇斗艳，各擅胜场。从更加长远和根本的观点来分析，现代散文自然离不开对优秀古典散文的传承、融铸和发展，何况最早的一批散文名家又都是学贯中西、精通古今的饱学之士。问题在于：第一，必须置于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来看待“继承”的问题，不能把“继承”看作是一个静止的孤立的过程。在“尊孔复古”甚嚣尘上，八股流毒远未肃清，人民大众对国外情况知之甚少的大背景下，对古典散文的取舍、扬弃必然着眼于主要方面，以“民主”、“科学”的呼声为依归，当时不少作家推崇晚明小品便是一例。第二，必须深入理解“继承”的多层次涵义，诸凡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爱国情结，情景交融、物我一体的审美情趣，自然浑成、简练含蓄的民族风格，自由灵活的汉语表达方式，等等，均是对散文发展起着长期作用的主要因素，必然会或早或迟地进入现代散文家的视野，

并潜移默化地产生效果。证之以散文后来的发展,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。如舍弃以上这一切,只注意章句、“义法”、典故之类,那就会仅得其皮毛而失其神髓。第三,尽管我国散文历史悠久,但传统所谓散文是指与韵文、骈文相对的散行体文字,范围极广,大量的哲学、历史文献在其中占据着主要的位置。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,推进新文学的健康发展,必须确立新的散文文体观。有鉴于此,刘半农首创“文学散文”之说。他在《我之文学改良观》中作了如下的区分:各种科学论文“系文字而非文学”;新闻通讯,如“普通纪事可用文字,描写人情风俗当用文学”;私人之日记信札,一般实用文字,然如游历时之日记,亦可“涉及文学”,等等。刘半农上述区分,看似缩小了“散文”的领地,其实是夯实了“文学散文”的基础,为现代散文的发展进而超越古代散文创造了条件。稍后,周作人提倡“美文”不遗余力,极大地提高了白话抒情散文的地位,他还不顾正统古文家的反对,从古典散文遗产中挑出“独抒性灵”的明代小品,用来和“五四”时期自由、活泼的思潮相接轨,表现了他在“继承”方面的创造性。

在对我国古代散文遗产作出新的审视、评价的同时,西方的文学理论和创作经验,又不断输入进来。在散文方面,要算英国的 Essay(现通译为“随笔”)对我国影响最大。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《出了象牙之塔》一书,对 Essay 曾作过如下生动的介绍:“如果是冬天,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,倘在夏天,则披浴衣,啜茗,随随便便,和好友任心闲话,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,便是 Essay。”不言而喻,这种散文样式具有亲切、灵活、从容等特性,切合“五四”时期崇尚平等、自由的趋势和风尚,自然会受到散文作者的注意和欢迎。

上述种种,无不体现了对现代散文文体的自觉追求,体现了对中外散文遗产的认真借鉴。追求和借鉴的结果是:一、和范围广泛的古代散文不同,现代散文发展成“与诗、小说、戏剧并举而为新文

学的一个独立部门”(朱自清:《什么是散文》)。二、长期以来重在“载道”即代圣贤“立言”的“古文”,终于为个人抒情言志的现代散文所代替。

二

“五四”时期的不少散文作家具有锐意创新的精神。鲁迅不仅是小说大家,也堪称散文创作的多面手,他的《野草》是我国第一本现代散文诗集,篇幅不多,份量极重。论想像之奇特、意境之深邃、手法之新颖,可谓前无古人,后启来者,而作品所展示的那种孤独而偏要奋进、悲凉仍不放弃抗争的心境,更是令人咀嚼不尽。《朝花夕拾》是鲁迅中年时所写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,冷静的叙述中渗透着睿智的思考,活泼的场景里寄寓着无限的感慨,抒情的笔墨里不乏机智的嘲讽,某些当时不甚了了的事件开始具有了触目惊心的时代意义;而作者笔下各具个性的长妈妈、藤野先生、范爱农等人物,也带着深刻的时代印记,耸立在我国现代文学的长廊里而毫无愧色。周作人取法英国随笔和明末公安派小品,形成了冲淡平和、庄谐杂出的风格,创作了《喝茶》、《苦雨》等一批融知识、哲理、趣味于一体的生活小品,对以后的小品文创作影响颇大;不足之处是说明多于抒发,随意难免琐屑。朱自清是一位“富于至性深情”(朱光潜:《敬悼朱佩弦先生》)的作家,他所写的《背影》等怀人忆旧的散文,同样是返朴归真,不假雕琢,“富于至性深情”的作品。他对散文的又一独特贡献是景物描写。对自然景物的观察十分精细,对形状、声音、色彩的感觉尤为敏锐,几乎到了毫厘必辨、一丝不苟的境地,而行文又极为活泼流畅,琅琅上口。冰心受古典文学和西洋文学的双重熏陶,而能融会贯通,臻于化境。她的《寄小读者》、《往事》用清丽典雅的文笔,不倦地赞颂着纯洁的母爱和童心,地域、环境不同而主题一贯,感慨、联想万端而基调不变。究其实,这些温婉的文字同样体现了“五四”精神的一个侧面,向着蔑视妇

女、儿童的封建卫道士进行了抗争。

新文学第一代散文家中,还有郭沫若、郁达夫、叶圣陶、许地山、茅盾、俞平伯等人,各以富于艺术个性的作品,为现代散文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。

总起来看,不管散文家的创作道路怎样不同,风格如何殊异,凡是成功之作,都渗透了“五四”的理性精神,都符合启蒙思想家向新文学提出的一个共同原则:“立诚”、“写实”(陈独秀:《文学革命论》)。“立诚”,要求展示自己内心时不掩饰;“写实”,要求表现现实时不虚假。回顾“五四”前夕至二十年代前期的散文创作,除了勇于创新开拓以外,就要数“立诚”、“写实”最可贵了。正是这两个特点,为以后散文的发展繁荣带了一个好头。

三

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,现代散文创作进入了成长期、收获期。

创作队伍不断扩大。第一批散文家多数笔耕不辍;此外,又有不少受到新文化运动熏陶的作者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,著名的有巴金、老舍、沈从文、梁实秋、梁遇春、李广田、吴伯箫、何其芳、柯灵、陆蠡等。他们以热情和彩笔丰富了现代散文创作的天地。

如果说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使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树苗长在文艺园地之中,那么,到了二十年代中期以后,现代散文已经变得枝繁叶茂,硕果累累。除狭义的“美文”即抒情散文以外,杂文随笔、游记小品、通讯特写、书简日记、散文诗、回忆录等,应有尽有。以鲁迅为核心的杂文创作,作为军阀压迫和国民党政府文化“围剿”的对立面,长期发挥着“匕首”、“投枪”的作用,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转入低潮。与此相反,反映抗日战争的报告文学异军突起,由于民族存亡所系,全国人心所向,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抒情散文是兼具叙事和抒情两种因素而又以抒情为依归的散文样式,曾经广泛地被称作“小品文”^①。抒情散文取得的成就最大,拥有一大群流派、风格、个性各异的作者,对此分门别类,条分缕析殊属不易,不妨看看朱自清的评述。朱自清从文学渊源和创作宗旨着眼,指出小品散文“有中国名士风,有外国绅士风,有隐士,有叛徒”(《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》),不失为化繁为简、提纲挈领之谈。如徐志摩长期留学英美,深受英国文学和生活方式的影响,他的散文不仅爱写“康桥”、“翡冷翠”等异域风光,连行文也富丽华美,风流潇洒,充满了英国浪漫主义气息。梁遇春的散文漫谈知识,探索人生,显得顾盼自如,灵活多姿,常常在连番的比喻和俏皮的笑语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,从中不难看出英国散文家兰姆的影响。冯至以诗人名世,曾留学德国,他所写的《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》等散文,全从西欧的生活习俗和历史传说取材,而行文的语言和风格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,朴实蕴藉,富于诗意,实属难能可贵。“五四”时期倡导“美文”的周作人是又一种类型的作家,他凭着渊博的知识和娴熟的技巧,继续关在“苦雨斋”里写着有关古董风俗、花鸟虫鱼之类的小品文,俨然是一位置身于都市中的“隐士”,洒脱从容的“名士”。比较下来,更多的散文家还是扎根于华夏本土,他们在借鉴外国文学的同时,更着重汲取中华文学艺术的宝贵传统(当然和周作人等人的“中国名士风”又并不相同),其中成就卓著的有巴金、老舍、丰子恺、沈从文、李广田、吴伯箫、何其芳、萧红等人。他们关心世态,探索人生,心忧祖国的前途,情系亲友的安危,而对劳动大众和弱势群体则一无例外地流露出由衷的同情。如就语言风格而论,则或缜密,或委婉,或遒劲,或质朴,虽

① 从胡适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李广田等家的论述来看,“小品文”多半含有篇幅短小、任意而谈、多写身边感受等意思,因为和“五四”时期崇尚自由、活泼的趋势相符合,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欢迎,后因文学界对“小品文”的理解不尽相同,到了三十年代更发生了一场争论,双方各执一端,互不相让,在有些人的心目中,“小品文”成了“小摆设”的同义语,这个称谓才渐渐淡出。

然不尽相同,但总是深得汉语语言艺术之精髓,比起白话文运动初期的“白话散文”来,要成熟多了。至于像叶圣陶那样注意提炼口语,力求畅达洗炼,老舍那样善于在散文中运用生动活泼的北京话,更是让人有洗尽铅华、返朴归真之感。

游记在三十年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,写得最好的当推郁达夫、沈从文。郁达夫博学多才,游历甚广,他不仅对山水风光的观察精细入微,而且熟悉当地历史掌故、人物事件,加上他又爱即兴赋诗,借酒浇愁,所以一旦发而为文,便使人文和风光合为一体,诗词和散文相互生辉,分外绰约多姿。沈从文的风格又迥异于郁达夫,他笔有藏锋,不让感情任意外露,对景物描写既绘声绘色,又讲究简明节制,富于独特的隽永空灵之美。他还常常深情地穿插一些湘西底层人民的生活片断,读来又俨然是一幅幅传神的湘西风情画。

散文诗进展的步子不够大。散文诗重在抒发深邃绵密的情思,要求作者具有敏锐的心灵和丰富的想像力,何其芳、陆蠡、丽尼在这方面表现不俗,均有佳作问世。

“七七事变”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,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,也强烈地影响着现代文学的走向,进步文艺界提出了“文章下乡,文章入伍”的号召,以后在解放区更进而要求文艺工作者和广大民众打成一片。残酷的战争要求突出文学的功利价值,反映在散文创作上,不少作家不再醉心于表现“身边琐事”的自我抒情,而是努力把反映大众斗争生活作为自己的使命——报告文学的蓬勃发展正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,这一切自然是势所必至,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进步性。不过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,还是李广田表述得比较实在、全面:“写血雨腥风自然很好,写身边琐事也不一定不好,因为身边琐事也可能有血雨腥风的气息。由近及远,自浅而深,原是最容易写得亲切真挚的办法。”(《论身边琐事与血雨腥风》)如何评析描写“血雨腥风”的报告文学,不在本文的叙述范围之内,我们只想提请读者不要冷落了那些从切身感受写起的文

质并茂的抒情散文：郭沫若《由日本回来了》、老舍《我的母亲》、巴金《废园外》、茅盾《白杨礼赞》、丰子恺《辞缘缘堂》、施蛰存《驮马》等。

还应该提一下幽默散文。照一般人看来，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似乎和幽默无缘，何况又是在炮火连天、物质极端匮乏的抗战时期。然而恰恰在这时期出现了梁实秋的《雅舍小品》、王了一的《龙虫并雕斋琐语》和钱钟书的《写在人生边上》，对此应该如何理解？原来，作者面临窘境而不气馁，遭受困难而仍谈笑从容，这正是作者在精神上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，是作者博学广闻、奇思妙想的学者风度的表现。于是，简陋的房子成了“雅舍”（梁实秋《雅舍》），昏暗欲灭的菜油灯成了“天之骄子”（王了一《灯》），这些对于同样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不失为一种慰藉。钱钟书的风格又和梁、王二家不同，他的幽默散文以汪洋恣肆、犀利机智见长，常常从人们见惯不惊的现象出发，然后层层逼近，多方设喻，终于得出了超凡脱俗的精湛见解，使读者豁然开朗，有所醒悟。

四

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，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，社会秩序稳定，国民经济恢复，广大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，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。遗憾的是历史进程并未如人们想像的那样笔直平坦。自1957年以后，政治形势忽阴忽晴，个人崇拜逐渐抬头（严格说来，此前像反胡风集团等斗争已呈现出左的朕兆），文学包括散文创作也只得载沉载浮，曲折前行。

总观建国后十七年的散文创作，无不受着“颂歌”和“战歌”这一主旋律的深刻影响，不过各个时期各种样式又有所不同。建国初期是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，出现了一大批表现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。杂文曾在1956年提出“双百”方针和六十年代初实行调整期间活跃了一阵，终究因不

合“颂歌”的标准而偃旗息鼓。在散文诗创作中,围绕某个象征物进行想像和歌颂的写法最为普遍,由于不敢触及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,缺乏对内心世界和人生真谛的深入探求,加上艺术手法不够多样化,因此总体上显得轻情有余,深度不足。比较下来,十七年间还是抒情散文的成绩最大。这主要是因为抒情散文向来是散文创作的主流。建国后十七年抒情散文的优秀作品有巴金亲切自然的《从镰仓带回的照片》,冰心真挚隽永的《樱花赞》,杨朔诗意盎然的《茶花赋》、《荔枝蜜》,刘白羽激越高亢的《日出》、《长江三日》,秦牧谈天说地的《土地》、《潮汐和船》,吴伯箫朴实醇厚的《记一辆纺车》、《歌声》,徐迟奇丽空灵的《黄山记》,菡子委婉细腻的《黄山小记》,翦伯赞充实活泼的《内蒙访古》,曹靖华绘声绘色的《忆当年,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!》,等等,可谓流光溢彩,争妍斗艳。这许多散文佳作多半出现于六十年代前期,当时调整文艺政策,文艺界的环境较为宽松,散文家便乘势而进,各显身手,终于形成了1961年的“散文年”和以后持续两三年的繁荣局面。

在众多的名家高手中,最引人注目的是杨朔、刘白羽、秦牧三人。杨朔等三人的共同功绩在于使抒情散文摆脱了通讯特写的影响,不再过多地停留于对工农兵及相关事件的如实描写上,而是敏锐地捕捉现实生活中的闪光点,反复体察它对自己心灵的触发和感受,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散文艺术最宝贵的抒情特性。有趣的是,杨朔等三人的艺术探索虽然目的相同,途径却大有差异。杨朔让散文向诗靠拢,把散文“拿着当诗一样写”(《东风第一枝·小跋》)。他常常精心选择一个中心意象,巧加铺垫,由实而虚,逐步展示其象征意蕴,然后在结尾处出人意料地揭示主题,戛然而止,显得曲折有姿,晶莹剔透。刘白羽让散文向政论靠拢,他观察日出、江河等景观时细致入微,描写时尽情挥洒,然后在关键之处升腾起理想的火花,把历史和现实交织起来,抒发无穷的赞颂和感叹,读来颇有几分雄辩的政论家的色彩。秦牧善于从知识宝库中汲取养料,

同时又借鉴了“杂文”的手法，围绕中心，说古道今，旁征博引，夹叙夹议，融哲理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为一体，具有娓娓动听的艺术效果。

在忽视个性、情趣和科学知识的年代里，杨朔等三人的散文创作不失为一种勇敢和及时的尝试。不过，由于杨朔、刘白羽过于“诗化”，过于追求“意境”和“形散神不散”的结构模式，有时就难免显得做作，夸张、渲染得过了头。其实，散文的天地是无限宽广的，既可以热情地颂“美”，也可以冷峻地写“丑”，既可以精致巧妙，“形散神不散”，也可以“散”得平易浑成、自然从容，等等。

五

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举行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、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。文学艺术这个重灾区终于峰回路转，换了新貌。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不时有料峭的寒风，恼人的冷雨，但以“实事求是”为指针的思想解放运动毕竟是大势所趋，谁也无法改变文学创作（包括散文）日趋繁荣的局面了。

最先涌现的是一大批悼念散文。十年浩劫，苦不堪言，蓄之既久，其发必速，全国上下很快掀起了声讨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热潮。在清算林彪、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时，散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许多作家和非作家纷纷执笔撰文，缅怀敬爱的周总理，悼念刘少奇、彭德怀、贺龙、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，控诉“四人帮”迫害革命者的血腥行径。尽管悼念散文以珍贵的史料价值取胜，但其中确实也有不少文质俱佳、声情并茂之作，如《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好总理》（冰心）、《一封终于发出的信》（陶斯亮）、《痛悼傅雷》（楼适夷）、《刑场归来》（公刘）等，读后无不令人怦然心动，潸然泪下。短期内有如此多的悼念之作问世，是中国散文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。

作家们没有长期地停留于单纯控诉的阶段,他们又很快进入了反思和追索,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巴金的散文创作。八十余岁高龄的巴金把五集《随想录》对“文革”的性质、危害以及产生的根源作了深切的反思,痛切陈词:“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,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”(《人到中年》)。文集还用质朴无华的语言描述着故人的面容,对一切未被“文革”浊浪淹没的美好的东西发出了由衷的赞颂,尤其是祭悼亡妻的长文《怀念萧珊》,把深切的反省、痛苦的内疚、真挚的怀念交织起来,更是回肠荡气,感人至深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正是以巴金为代表的《随想录》,告别了“伤痕文学”,开启了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新局面。

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增加了不少新人。所谓“新人”,并非简单的“年轻人”的同义语。具体说来,包含了如下不同类型的作家:一类是平反冤假错案以后复出、归来的老作家,如萧乾、黄裳、吴祖光、邵燕祥等;一类是各方面的学者、艺术家在“主业”之外兼写了不少散文,如季羨林、金克木、张中行、周汝昌、吴冠中等;第三类才是晚出的散文家,如贾平凹、梁衡、余秋雨、史铁生、赵丽宏等。

新时期散文的最大特点是个性的充分发扬和文体的自由发展。以上述几类作家来说,“复出”的散文家历尽沧桑,深受磨难,执笔为文时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。众多学者、艺术家大胆解放思想,以充分的自信、从容和睿智引导读者进入了色彩缤纷的现实生活和文艺天地。新出的散文家视野开阔,勇于作出新的艺术创新和探索。总之是各尽所长,异彩纷呈。以散文的具体样式而论,由于改革开放的迅速进展,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众多矛盾,报告文学空前繁荣,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。由于拨乱反正,对大量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了新的历史评价,加上我国向来有“以史为鉴”的宝贵传统,遂使回忆录和人物传记蓬勃发展,给了读者崭新的启示和强烈的震撼。本文对此不拟展开,只想从狭义散文的角度,对抒情散文、游记、随笔等稍作评述。

抒情散文取得了新突破,个性的成分大大增强,思想不断深化,而风格和表现手法也更加多样了,真正克服了建国以来常见的“颂歌”和“战歌”的单一格调。人们仿佛又闻到了从“五四”到二十年代前期散文创作清新活泼的气息,当然,这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回归,而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:增添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深沉的历史沧桑感。

杨绛《干校六记》一书写自己随丈夫“下放”干校的种种遭遇,所用的几乎全是叙述的语气,对外界的一事一物之微,内心的一喜一惊之状的描绘,都显得具体逼真,历历在目,没有任何过头的渲染和夸张,更不要说大段的感叹和议论了。读了这样富于内涵和分寸感的散文,反倒使人感到深刻隽永,耐人回味。孙犁写了不少寓至情于平淡的佳作,回忆了和赵树理、李季、郭小川等作家文友交往的经过。作者这样表述自己的写作主张:“我坚决相信,我的伙伴们只是平凡的人,普通的战士,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、绝对化了的人。”(《晚华集》)和“四人帮”的“假大空”的文风相对照,阅读孙犁真诚、淡泊、洗炼的散文,谁都感到亲切、自然、可信。毫无疑问,从思想感情的表达和语言行文的风格来看,杨绛、孙犁等老作家所继承和发扬的是“五四”时期“立诚”、“写实”的宝贵传统,是以朱自清为代表的散文创作主流,而又显得更加详尽绵密(如杨绛),苍劲淡泊(如孙犁)。新出的散文家稍有不同,他们的感情较为浓烈,也间或有深沉的哲理或玄思,不过也同样克服了以往那种常见的滥情和说教的倾向。贾平凹的《商州初录》系列散文,用散点透视的方式,多角度多侧面地描绘了陕南商州一带的历史传统、地理形胜、风尚变化,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。可以看出,他继承和发展了“五四”以来沈从文等人的“谈话风”散文传统,用工笔细描却又畅达活泼,毫无繁琐逼仄之感,以纯熟的充满泥土气息的白话为基础,而又恰到好处地融入了典雅简练的文言词语,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。梁衡的散文追求“大气”,自觉地和那些琐屑无

聊的“小散文”划清了界限。他爱写历史人物和山水游记，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，他的《大无大有周恩来》、《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》、《把栏杆拍遍》等，对以往的历史进行崭新的审视和思考，进而选择独特的视角，有声有色地深入到周恩来、瞿秋白、辛弃疾等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，体现了强烈的现代理性和忧患意识。还不应该忘记小说家加盟散文创作后所带来的新变化。如王蒙在散文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“意识流”手法，扩大了散文表现的时间和空间。

随着近年来交通的日益发达，国际交流渐趋增多，人民冲破了封闭的生活方式，这些无异于为游记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以往不少游记“醉翁之意不在山水之间”，在描山摹水之后忘不了点明主旨：赞颂美好的生活和制度。新时期开始有人倾全力于自然景观的描绘，因而显得尽态极妍，赏心悦目，提高了作品的审美价值。

随笔类散文的成就尤为喜人，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，更是佳作迭出，绚烂之极，预告着它今后必将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途。这类散文继承了“五四”时期“小品文”的传统而又有新的突破和进展，不再是纯粹的身边琐事，而是琐事不琐，言在此而意在彼，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由近及远眺望人间的窗子；不再是一味的絮语和闲话，而是综合运用了叙事、摘录、议论、抒情等因素，显得格外活泼多姿。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贡献很大（当然不必硬性定名为“学者散文”，以职业、性别等区分散文门类并不科学），他们坐拥书城，神驰四方，以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语言功力为后盾，一旦执笔为文，不管是读书札记、创作体会、世相杂谈、历史旧闻、序跋书信，均能收增长见识、陶冶性情之效。

六

台湾现当代散文走过了一条独特的漫长的道路。

台湾散文固然有因政治、历史环境所造成的种种差异，但毕竟